

# 抗战时期的陕西工合运动

## 钩  沉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我国沿海城市相继沦陷,抗日根据地及后方的军需民用物资极为匮乏。为抗击日本侵略、发展民族经济,国际友人路易·艾黎、埃德加·斯诺夫妇等人发起了一场工业合作社运动(简称工合运动)。在国共两党的支持下,中国工业合作协会于1938年8月5日在武汉成立。

而作为祖国大后方的陕西成为中国工合运动的发祥地。1938年8月26日,中国第一个工业合作社在陕西宝鸡诞生了。随之,中国工合协会在西北、川康、东南、西南等地区设立工合办事处,并下设工合事务所,组建各种工业生产合作社。工业合作社成为失业工人和难民生产自救、支援抗战而兴起的一支独特的经济力量,它为供应战时的军需民用、支持长期抗战作出了巨大贡献。

西北工合办事处设在陕西宝鸡,业务分布于陕、甘、晋、豫、鄂、绥六省。截至1942年9月,西北区拥有25个事务所,陕西就有12个事务所。其中,陕西中部以宝鸡为中心,在西安、凤翔、陇县、双石铺、大荔、耀县均设立事务所。在陕南设立了南郑、安康、勉县事务所,在陕北设立了延安、榆林事务所。陕西的12个事务所共计组成近500个合作社,社员近10000人。如果算上参加工合工作的雇工学徒和军需弹药工人有近10万人,每月的生产总值近1000万元。整个西北区原有资金、政府贷款与银行贷款合计500万元。

### 宝鸡被誉为“工合城”

中国工合协会成立之后,首先考虑的是以何地为突破口尽快建立合作社。经过一番分析之后,他们把目标锁定在陕西宝鸡。位于陕西西部的宝鸡,在战前只不过是一个边陲小县,交通闭塞,市面冷落,外省人很少知道这个地方。抗日战争爆发后,宝鸡作为抗日战争的补给后方,凭借着地理优势等因素,成为工合运动发展的理想宝地。

1938年8月23日,著名经济学家卢广绅同上海技工孙夏威奉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的派遣来到宝鸡,他们说服7个铁匠组织成立一个工业合作社,取名为天星大华手工铁器合作社,这是中国工合运动开展后创建的第一个工业合作社。同时,他们在原宝鸡县城西门里(今宝鸡市金台区中山西路)挂牌成立了“中国工业合作协会西北区办事处”,这是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建立的第一个派出机构。有了第一个合作社的示范带动,宝鸡工业合作社的组建工作发展很快。不到半个月时间,宝鸡就成立了10多个合作社,其附近地区也组建了40多个合作社。在陇海铁路沿线的绛帐、蔡家坡、虢镇、十里铺以及秦岭山中的双石铺等地,合作社遍地开花。两个月后,全国的工业合作社已经发展到200多个,星星之火竟成燎原之势。截至1939年9月,即中国工合协会成立一周年之际,宝鸡的工业合作社已达104个,社员1076人。

抗战期间,西北工合办事处的总部就设在宝鸡。宝鸡不但是中国工合运动的发祥地,而且是全国工合运动开展的模范城市。埃德加·斯诺在其著作中将宝鸡称为“工合城”。

### 凤县双石铺被誉为“工合天堂”

凤县双石铺位于陕、甘、川的交通中枢,战略地位十分突出,抗日战争爆发后,这个人口不足2000人的小镇很快繁荣起来,成为西北的交通重镇。凤县煤矿、铁矿资源丰富便于发展工业,开展后方生产,支持长期抗战。1939年4月,工合西北办事处将采矿办事处改为双石铺事务所,负责双石铺地区所有工业合作社的事务。双石铺事务所自成立后,组社发展迅速,到1940年4月底,合作社已发展到23个,社员361个,社股3554股,股金总额达到33330元。合作社主要从事机器、纺织、陶瓷、缝纫、采矿等14个项目,并有供销社一所。其中机器社、制革社、水力磨面社、耐火砖社规模最大。机器合作社除了能制造磨磨等机器外,还能制造手枪、步枪,他们还利用嘉陵江的河水进行水力发电,使双石铺首次有了电灯照明,在社会上享有很高的信誉。双石铺不但设立了工合医院、工合小学,而且设立了培黎工艺学校。中国工合运动创始人路易·艾黎后期常住在双石铺指导工作。双石铺当时的一条主要街道(现在的新民街)被称为“工合路”。

1940年2月,双石铺成立了生产合作社联合社,将各社的生产、供销计划系统地联系起来,使之更有利于工业合作社的发展。1940年4月,又成立了甘肃徽县和凤县黄牛铺两个通讯处,以便利事务所对区内各合



工合社员正在学习使用新型纺车。

作社的联系与指导。特别是这一年,毛泽东派刘鼎、康康伯、黎雪、赵一峰等从延安来到双石铺,帮助路易·艾黎研究西北工合发展计划,推进工合运动的发展。

### 工合运动走向延安

抗战爆发前,陕甘宁边区工业几乎为零。除了农村的家庭纺织外,只有若干硝皮场、制毡坊和煤炭场,唯一可称为现代工业的石油,由于内战在30年代中期大都停止了生产。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在苏维埃地区建设了修械所、被服厂和印刷厂等,这些也不过是维持部分军需而已。

抗战爆发后,对手工业的需求大大增加,作为以手工业为主的生产组织迅速发展壮大。延安发展工人合作运动的历史要追溯到1937年底,当时由两个失业的鞋匠发起,在总工会的领导下成立了延安工人合作社,逐渐扩大到鞋厂、被服厂、木厂、炭窑窑以及制糖、豆腐、豆芽、理发、饭店等12个单位,共120名工人。1938年,边区还设立了卫生材料厂、难民纺织厂、兴华制鞋厂、农具厂和振华造纸厂等,延长石油厂也重新开始生产。工合运动为边区的工业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发展契机。

1939年3月26日,经中共中央财政经济部部长李富春批准,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延安事务所正式成立,事务所设在山坡上的一排5孔窑洞里。陕甘宁边区政府财政厅厅长、银行行长曹菊如任主任,边区政府建设厅



斯诺夫妇在菲律宾。

工矿科科长孙齐东主持日常工作。中国工合协会拨给延安事务所1500元开办费和20000元贷款,每月拨给300元经营管理费。据统计,从路易·艾黎及海外华侨汇到延安工合事务所的捐款,1939年为483232元,1940年为698190元。

延安工合组建了涉及工、农、牧三个产业,包括军民用许多生产合作社,激发了劳动人民的生产智慧和热情,在促进经济、文化、医疗等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为进行游击战和持久战,打击日本侵略者提供了物质保障。路易·艾黎回忆说:“延安工合事务所是在陕甘宁边区政府的直接领导下,遵照边区合作政策,与边区政府建设厅合作科合作,推行各种合作事业,分为生产、边防、农业、医药、消费、信用、供销等合作社,发动群众,尤其为人民生活 and 抗战服务。宝鸡办事处只是按规定每月发给经费,无权干预它的社务和业务,因此它有充分从边区实际出发推行合作经营的自由。”

延安工合事务所成立当年,延安就建立工业合作社10个,有社员199人,资金11315元;1940年,合作社发展为17个,社员386人,资金59951元。虽然工合总会1941年2月以后停止了对延安工合的资金援助,但在宋庆龄倡导的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帮助下,延安工合事业依然迅速发展壮大:1941年合作社27个,社员696人,资金339538元;1942年,合作社50个,资金2491600元,当年的月平均产值由1939年的60000元增加到2300000元;1943年,合作社214个,社员2305人,资金97129000元;1944年,合作社691个,社员245866人,资金440266800元;1945年,延安工业合作社发展到882个,社员总数增加到265777人,资金3890869948元。延安的工合机构成为全国最大的地区总分会。

延安工合在边区政府的倡导下,依靠群众组织,发动工农群众、家庭妇女和各种手工业者加入合作社,使边区的合作事业得到巨大的发展。他们用最简陋的设备,克服重重困难,开展技术革新,因地制宜地生产地区必需品,紧缺物资和特色产品,补充了延安地区公营经济的不足,对于解放区战胜经济困难,发展边区经济起了很大的作用。

### 陕南的工合运动

陕南的工合运动主要集中在南郑、勉县、安康。其中南郑在抗战初期处于西汉公路、汉白公路、川陕公路的交汇点,是陕南、陇南、北川三角地带的政治、军事中心,且物资极为丰富,有制造炸弹和手榴弹的生铁及造纸的原材料,如棉花、竹子等都有相当产量。1938年夏,南郑事务所在城内川主庙后街成立。在抗日战争期间,南郑工合事务所共创办了50个工业合作社,社员六七百人,组建了染织、机器、缝纫、米面加工、棕箱、骨器、文具、化工、砖瓦、制鞋、制革等合作社,生产了当时人民急缺的生活物资,改善了民生,稳定了社会。勉县是陕西西部汉江流域的一个著名的沙金产地。抗战爆发后,黄金成为换取外汇的重要资源,中国工业合作协会西北区办事处鉴于这个原因,于1938年在勉县武侯镇设立了采金工程处,组织采金工业合作社,通过贷款给难民,组织了98个淘金合作社,拥有1600人,每月收购黄金3.75—4.69公斤。

抗日战争爆发后,安康成为支援华中战场的后方

重镇。汉江流域的沙金西起略阳、东至安康,沿汉江直达武汉,安康城南为新开辟的汉白公路,交通十分便利。为了发展当地工业,1939年9月,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在安康设立事务所,至当年年底,已经建立起淘金、榨油、纺织、制革、造纸等合作社11个,社员320人。到1940年5月,淘金社增加到58个,丝织社3个,制鞋社1个,有社员1950人,股金达到6421元。

### 不作为重点发展的西安工合

西安作为陕西的省会城市,交通便利,各种产品均集中在该地,为工业的发展创造了很多优良条件。为了避免敌机轰炸,西安开始时以不组社为原则,但为了工作方便,1938年10月西北工合办事处在西安设立通讯处,1939年4月改为事务所。西安工合的主要工作是代西北工合办事处各事务所及各合作社在西安与有关部门接洽事务,从事宣传,调查登记技术工人,购置并负责转运机器设备等事宜。为了支持前线抗战,西安工合相继组建了服装、制鞋、药棉、纱布、军毯等13个合作社,先后承制军毯数十万条。由于敌机大肆轰炸,为了避免无谓的牺牲,西安市疏建委员会特令市民及各工厂疏散。许多小企业资金匮乏,无力转移,西安工合事务所主动作为,积极向有困难的工厂提供贷款,帮助企业渡过难关。

### 陕西工合运动的历史贡献

抗战时期,以宝鸡为中心开展起来的轰轰烈烈的陕西工合运动,不仅为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而且对偏僻落后的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诸多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

生产军需民用物资。“以适应军事需要为第一、注重军队日用品之制造,以增强抗战实力”为组社原则,陕西工合组建了一批机器合作社,既能修理和制造其他合作社的机器,同时又能制造枪支弹药。为了支援抗日前线,一些合作社成为流动合作社,跟随游击队流动,为抗日前线提供军需和日用品。如1939年12月,宝鸡工合社在西北工合发动的百万军毯运动中一次就供应了50000条军毯、36000件军大衣。

解决难民生活困境。抗战初期,大批难民流入内地。为了抗战后方的稳定,陕西工合将难民组织起来进行培训,提供必要的资金和劳动条件,利用当地的原材料生产自救,使他们暂时摆脱了颠沛流离之苦,同时也增加了社会财富,支援了抗战前线。其中,宝鸡合作社的十里铺,就是流亡的难民组成的。1938年,西北区的第一个采矿合作社由一批东北难民在陕西建立的,取名为利华采矿合作社,日产无烟煤达20吨。短短几个月内,陕西就有了17个由难民组建的生产合作社,为前线抗战作出了重要贡献。

培养工业技术人才。为了给工合运动培养更多技术人才,西北工合先后在宝鸡、双石铺创办了培黎工艺学校。双石铺培黎学校位于秦岭山区的凤县双石铺。



接受“工合”训练的年轻女工。

学校创建初期,条件十分艰苦,设施简陋,只有三间校舍,一台织布机和一台绕线机,十几名学生。英国记者乔治·何克担任校长之后,培黎学校走上了正轨。到1942年底,学生就达到60多人,开设了纺织、机械、化工、会计、英语5门专业课程。由于国民党的迫害,1944年12月双石铺培黎学校搬迁至甘肃山丹。培黎学校为新中国的工业建设培养了大批技术骨干,促进了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

创新合作医疗卫生。抗战初期,西北地区的医疗条件十分有限,医疗卫生落后现象十分普遍。西北工合在资金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建立了医疗服务机构。第一个工合医院于1939年5月在凤县双石铺成立,开办的第一年就收治门诊病人4092人。1941年,宝鸡遭受回归热等传染病的威胁。为了治疗传染病,缓解疫情,工合医院从双石铺搬到宝鸡,凤县双石铺仍留有医务人员继续为当地工合社员和民众诊疗疾病。搬迁后的工合医院,每天的门诊七八十人,后来医院迁到东南城巷原宝鸡工合事务所旧址,规模扩大了一倍,建设了住院部和疗养院。工合运动通过合作医疗,引进了现代化医疗技术和设备,改变了落后的医疗卫生状况。

在抗战时期的工合运动中,陕西工合最为活跃,为克服战时经济困难、支援长期抗战、发展大后方经济、维护后方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作出了突出贡献。

□张译文



## 往  事

历史几乎没有不经过后人加工的。大凡读史,倘非积有年所,深做专门研究,很难触摸到历史的深处。每为史家或准史家平静或热闹的叙述所左右而昧于其背后的珍稀和潜藏的真相:“陕大甘虫”,有大量确凿史料证明是陕籍刘守中别出机杼,智赚戴季陶的“苦肉计”,不意竟被人风传为戴氏侮辱陕甘之语;“西北农校”(即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前身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当年谁都清楚分明是戴季陶在陕被逐后率先发起、领衔创办的,不意现在功劳竟都悉归于右任、杨虎城名下,假的居然成了真的,正说明了这种情况。

西安的玉祥门也是这样。如名所示,此门无疑是西安“围城”之后为纪念冯玉祥将军解围之功而开的。其开辟的时间,史家多说是民国十七年(1928年),也有说民国十六年(1927年)的,还有首鼠两端、忽这忽那的(史红帅、吴宏岐《西北重镇西安》第57页:“民国十七年(1928年),陕西省政府主席奉哲元下令在西安城墙安定门(今西门城)北侧开辟了玉祥门。”第280页:“东城墙中山门和西城墙玉祥门为1927年新辟”)。有关是谁主持开辟的,说法不一,一般多认为是宋哲元,但也不排除是田雄飞手里开的。因为宋哲元代省主席期间的1928年5月—6月,又曾为田雄飞所代,两氏同为冯之得力部下,后者更有人以冯之心腹目之,因缘际会,并非没有这种可能。两事虽有争议,其脉络则尚称清楚,重要的是,以往说者只讲此门何时所开和何人所开,再未涉及其他更多的东西,给人的印象,似乎此门开辟之后就一直畅通无阻,名字也没什么变化,而实际上远非如此。

据西安市档案馆同事最近发现的史料,历史上之玉祥门确有甫辟旋闭的记载。如1934年7月21日西安市政工程处呈陕西省建设厅,就有“查本城西北方,原有玉祥门,曾经封闭”之语,声请“将此原设城门开启”,以便东西往来之大车一部分“径由该处出入”,希望省政府转咨西安绥靖公署酌定。

历史上玉祥门的名称,也曾有改而复改的经历。如1934年9月10日陕西省建设厅给西安市政工程处的训令,就有“西安绥靖公署参(二)字第—六九二号咨开:‘查开启玉祥门,便利交通,本署极为赞同,惟希在该门内修筑营舍数间,以便派兵驻守。再该门名称,如仍沿用玉祥二字,似觉不妥,相应咨请商改见复为荷’”等语;1934年9月25日西安市政工程处呈陕西省建设厅文所转西安绥靖公署参(二)字第—一八七七号咨又称:“东北门既为中山门,则西北门似以中正命名为宜。且值此复兴民族、领导群伦端赖领袖之际,以‘中正’字样命名,似觉意义较切。相应咨复,即希查照决定为荷”,1935年2月11日陕西省建设厅给西安市政工程处的训令,更有“再玉祥门名称,前经改定为中正门,现以火车站北门,业已定名为中正门,其玉祥门应即改定为西北门,仰即遵照”的说法。

原来,那些史家和准史家告诉我们的并非玉祥门的全部历史。

原来,我们过去关于玉祥门的认识,不完全是真的。

毫无疑问,玉祥门开辟之后,

确有几年是闭塞不通的(至少1934年7月以前是这样),并非我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一直都通着,虽然目前我们无从判断它是何时开始闭塞的,但它闭塞数年并且后来还须郑重行文申请开通,毕竟是不移的事实(1932年5月西安市政工程处《西安市区域全图》也可证明这一点)。玉祥门的名称,中间确曾有过一些变化(尽管时间很短),并非我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一直都这样叫法,虽然目前我们无从判断火车站新开门城(即现解放门)最终命名“中正门”是何缘由,又是在中间起的作用,但是此门曾经改称“中正门”,旋又改称“西北门”,毕竟也是不移的事实。而且:

其间牵肯定涉到中原大战后大的政治背景。其间无疑也牵涉到杨虎城、冯玉祥两人的微妙关系。

众所周知,中原大战即史所谓“蒋阎冯大战”是1930年爆发的,历时7个月,大战的结果是蒋介石胜利,阎锡山、冯玉祥落败,阎、冯通电下野,部队受蒋改编。此后数年,冯一直取与蒋和南京政府不合作的态度,1934年再次开启玉祥门,正是蒋、冯矛盾激化,冯玉祥倒灶的时候。

众所周知,1934年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正是杨虎城将军,而且从1930年11月—1933年5月,杨虎城还是陕西省主席,接的就是冯玉祥将军部下刘郁芳的事情。历史上冯、杨二人的不谐,人所共知;冯计杀郭坚,杨肯定不满;冯改编靖国军,杨拒不听命;“围城”后,冯、于屡请,杨都坚不赴省(一说精疲力竭,不愿再做军人;一说有人告状,担心冯再演郭坚故事)。后来二人虽然分属上下,但冯附蒋反共,杨没有盲从;中原大战前杨弃冯而投蒋,大战中杨率部对冯作战,又犹豫转战回陕,端了冯的老窝,其省主席的位子,就是蒋从冯手里抢过来给杨的。

试想,基此哪一点,杨不能封其城门而改其名称?他任主任的西安绥署都能提出改定玉祥门的名称,他任省主席的陕西省府就不能或不敢直接把玉祥门封了?

可惜,过去史家或准史家都没告诉我们这些,若非此次同事发现,

我们也很难知道这些,不知这段真相猴年马月方能为人所知。是他们在此问题上有盲区吗?也许,因为玉祥门毕竟封的时间不长(4年左右),她改名“西北门”也没有几年——1935年西安市政处《西安市区图》、1939年西京建委工程处《西京市现有道路交通图》均仍标其为玉祥门,改名“中正门”的时间更短,对一般人来说,苟非直接亲历或亲眼见过当时的文件,确实难以洞悉其详,但为何史家或准史家,既然自命他命为“解人”,则不可能不知,也不应该不知。所以我更怀疑,甚至宁愿相信其中极有可能存在“为贤者讳”的成分。两位将军都是著名抗日爱国将领,俱为陕西父老所广泛认可,解放后又都给以很高的评价,再提其早年的恩怨恩怨,似乎很不明智,不免有所顾虑(谓之“杞忧”也不为过),担心有损两人的形象。人多不能免俗,照说这种想法并非毫无道理,纵有史之难能,贵乎其信,而经此过滤,则玉祥门的历史便因此而减损了其本来的真实、丰富和生动,这无论对写史的、抑或读史的,恐怕都不能不引为莫大之憾事。 □王民权